

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# 儀禮全譯

彭林 译注



丛书题签 / 启功  
封面设计 / 张彪  
唐怡



ISBN 7-221-04433-3



9 787221 044334 >

ISBN7-221-04433-3

K · 382 定价：22.00 元

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彭林译注

仪礼全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丛书题签 启 功  
责任编辑 孟筑敏  
封面设计 张 彪 唐 怡  
技术设计 祖 明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承印厂质检科,保证调换。

邮政编码:550004

通信地址:贵阳市市北路 68 号附 1 号

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

电 话:(0851)6828993

## 仪 礼 全 译

彭 林 译注

---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0.25 印张 500 千字
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---

ISBN 7—221—04433—3/K·382 定价:22.00 元

##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（第二批 50 种）

**王元化**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、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，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，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，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。

湖北江陵人，生于1920年11月30日。1946年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，1950年起任震旦大学、复旦大学兼职教授，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。1955年因胡风案件牵连受审查，工作中辍。

王元化自3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，迄今已出版的专著有《抗战文艺论文集》（1939）、《文艺漫谈》（1945）、《向着真实》（1953）、《文心雕龙创作论》（1979年初版，1993年增补版，改名《文心雕龙讲疏》）、《文学风格论》（译文集，1983）、《文学沉思录》（1983）、《传统与反传统》（1990）、《思辩短简》（1990，1994再版增订改版为《思辩随笔》）、《清园夜读》（1993）、《清园论学集》（1994）。

**王运熙** 上海市金山县人。1926年生。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，留任助教，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。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、三、四届副会长，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三、四届副会长等。主要著作有《六朝乐府与民歌》、《乐府诗论丛》、《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》、《文心雕龙探索》、《中国古代文论管窥》、《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》（与杨明合著）等；主编的有《李白诗选》、《李白研究》、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（三卷本）等。

**李万寿（常务）** 贵州清镇人。1942年3月生。现任贵州人民出版社社长，编审。著作有《晏子春秋全译》、《贞观政要译注》（合著）、《历代名著序跋选注》（合著）、《古文精华》（合著）、《茶花女》（缩写本），此外有历代文学名篇赏析十余篇，收入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历代文学名篇欣赏》丛书。并用理宣、木子等笔名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各类文章数十篇。

**袁行霈** 江苏武进人，1936年4月生，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

## 编委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中文系，留校任教，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、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《国学研究》主编等职。主要论著有《中国诗歌艺术研究》、《中国文学概论》、《中国诗学通论》（合著）、《中国文言小说书目》（合著）等。

**程千帆** 湖南宁乡人，1913年生。金陵大学文学士，曾在金陵大学、四川大学、武汉大学长期执教。现任南京大学一级教授，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、中华大典编纂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中国旅游文学研究会会长、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、南京市文联名誉主席。主要著作有《文论十笺》、《古诗考索》、《史通笺记》、《校雠广义》、《两宋文学史》等（后两种系与人合著）。

**傅璇琮** 浙江宁波人，1933年生。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现为北京中华书局总编辑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，兼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。1992年起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。主要著作有：《唐代诗人丛考》、《李德裕年谱》、《唐代科举与文学》、《河岳英灵集研究》、《唐诗论学丛稿》、《唐人选唐诗新编》、《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》、《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》，主编《全宋诗》、《唐才子传校笺》。

**李立朴（执行）** 河北安平人，1954年5月生于西安。1986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，文学硕士。现任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。副编审。著作有《许浑研究》、《唐才子传全译》以及论文十余篇。

**黄涤明（执行）** 湖南邵东人，1947年生于贵州平塘。1982年广西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。获文学硕士学位。中国训诂学会会员。副编审。出版著作有《搜神记全译》、《贞观政要译注》（合著）、《历代名著序跋选注》（合著）、《古文精华》（合著）等。

## 出版说明

本丛书是国家“八五”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《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》(50种)的后续项目。该丛书陆续问世以来,得到社会各界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赞扬,荣获中宣部1993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,不仅在全国书市上被评为“最受读者欢迎的书”,而且在欧美汉学界十分流行,备受重视,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、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。

为满足中外读者要求《丛书》扩大规模、增加品种的强烈愿望,我们在50种书目的基础上,继续慎重选取四部名著50种(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)作为《丛书》的第二批书目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。在书目的取舍上,经部选取7种,从而将“十三经”全部出齐;史部的重点除《史记》外,决定选取我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巨著《畴人传》,以广泛传播中华科技先驱的事迹;子部之书,除两汉外,补充了宋明理学名著,艺术类、宗教类名著和历代的一些著名笔记;集部则突出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人别集,并增加了首批未上的一些著名集本,《书目》仍附于各书卷末。

本丛书(第二批50种)已被列入国家“九五”重点图书出版规划,我们将在全国学术界专家的鼎力支持下,加倍努力,把一套兼具权威性、通俗性、学术性、资料性的精品图书奉献给广大读者。

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

1997年7月

# 前 言

古代中国，最重视礼治。相传周公制礼作乐，平治天下。孔子以礼为“六艺”之一，教授弟子。其后历朝，多以“礼治”相标榜，礼制之详备，举世罕见，故素有“礼仪之邦”之称。《仪礼》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礼仪的典籍。汉武帝建元五年（前136），初置五经博士，《仪礼》即居其一。入唐，有“九经”，至宋，有《十三经》，《仪礼》均在其中，是为儒家经邦治国的煌煌大典之一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，自不难想见。

## 一、《仪礼》解题

人们习惯于把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合称为“三礼”。其实，“三礼”既不成于一人一时，性质也有区别。《仪礼》是礼的本经，故又称《礼经》，在“三礼”中，成书最早，而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。《礼记》通称《记》，原是附属于《礼经》的，内容多为对《礼经》的说解或阐发。《周礼》旧题《周官》，是讲官制的书，王莽时才更名为《周礼》。因此，汉人并不将这三部书相提并



称。东汉末，经学大师郑玄为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作注，于自序中云：“凡著三礼七十二篇。”从此始有三礼之名。

《仪礼》本名《礼》。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》：“献王所得书皆先秦古文旧书，《周官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之属，皆经传说记，七十子之徒所论。”其中的《礼》，就是指《仪礼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也只称“《礼》”，不称“《仪礼》”。汉人还每每有把《仪礼》称为《礼记》的，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“故《书传》、《礼记》自孔氏出”，此处的《礼记》，指的就是《仪礼》。《后汉书·卢植传》也称《仪礼》为《礼记》。此外，郭璞注《尔雅》称引《仪礼》文字，屡屡称其为《礼记》。这可能是《士礼》的经文之后，大多附有记的缘故。何休《公羊》注引及《仪礼》经文或记，则每每混称，而不加区别。据段玉裁考证，《礼》十七篇的标题，在汉代均无“仪”字。东晋元帝时，荀崧奏请置《仪礼》博士，始有《仪礼》之名，但未成为通称。如唐人张参《五经文字》引《仪礼》文字很多，但都只说“见《礼经》”。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，《礼经》用《仪礼》之名，遂成为通称，沿用至今。

先秦、汉初人好以篇首之字作为篇名或书名，《仪礼》十七篇的首篇为《士冠礼》，故又摘其篇首之字而名之为《士礼》。有的学者认为，《士礼》的得名，当由内容而起，因为此书所记，以士的礼仪为主。

汉代《仪礼》的传本有四种，即大戴本、小戴本、庆普本和刘向《别录》本。四种传本都将《仪礼》十七篇分为冠婚、朝聘、丧祭、射乡等四类，但只有《士冠礼》、《士昏礼》、《士相见礼》三篇的次序完全相同，其余各篇则不尽相同。四种传本的次序，以戴德本最为合理，此书以冠、昏、丧、祭、乡、射、朝、聘等八大纲为序排列各篇，《丧服》一篇相传为子夏所作，故列在最后。刘向《别录》本则以有关冠、昏、乡、射、朝、聘的十篇居先，有

关丧、祭的七篇列后，可能是前十篇为吉礼，后七篇属凶礼，全书依吉、凶、人神为序。戴圣本所定次序最乱，似无条理可寻。1957年，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一批西汉晚期抄写的《仪礼》竹、木简，共496支。据简的形制及内容，可以分为甲、乙、丙三种文本。甲本木简包括《士相见》、《服传》、《特牲》、《少牢》、《有司》、《燕礼》、《泰射》等七篇；乙本木简只有《服传》一篇；丙本为竹简，只有《丧服》一篇。其篇次不仅与今本《仪礼》不同，而且与二戴本不同，经研究，为东汉时即已失传的，后（苍）氏之庆普传本。从文字上看，丙本的《丧服》为单经本，经文之下没有传文；而甲本和乙本的《服传》均只有传文而没有经文，即所谓“单传本”，与今天所见经、传合一的文本不同，证明西汉时经文和传文是各自独立成书的。郑玄注《仪礼》时，认为二戴本“尊卑吉凶杂乱”，不可取从；而刘向《别录》本“尊卑吉凶次第伦序”，所以采用的是刘向《别录》本。

《仪礼》十七篇的内容，及于上古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宋人王应麟依照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对礼的划分方法，将十七篇分为四类：《特牲馈食礼》、《少牢馈食礼》、《有司》等三篇记祭祀鬼神、祈求福佑之礼，属吉礼；《丧服》、《士丧礼》、《既夕礼》、《士虞礼》等四篇记丧葬之礼，属凶礼；《士相见礼》、《聘礼》、《觐礼》等三篇记宾主相见之礼，属宾礼；《士冠礼》、《士昏礼》、《乡饮酒礼》、《乡射礼》、《燕礼》、《大射礼》、《公食大夫礼》等七篇记冠昏、宾射、燕飨之礼，属嘉礼。其实，《仪礼》的篇数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。郑玄引刘向《别录》，说《仪礼》为十七篇，但又说《别录》称《既夕礼》为《士丧礼下篇》，称《有司彻》为《少牢下篇》。如此，则《别录》所见《仪礼》则只应有十五篇，或者另有两篇已失传的文字。王充在《论衡·谢短》篇中说：“今《礼经》十六。”这是他所见《仪礼》的篇数，而荀悦《汉纪》则说：“高堂生传《士礼》十八篇。”歧异若此，莫衷一是。

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汉代的《仪礼》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两种。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，今文经则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目录：“《礼古经》五十六卷，《经》七十篇。”前者为古文，后者为今文。所谓《礼古经》，出于鲁淹中（或说出于孔子壁中），有五十六篇。“《经》七十篇”，即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《士礼》，“七十”乃“十七”之误倒。今文经只有十七篇。比古文经少三十九篇。今、古文《仪礼》都有的十七篇，内容基本相同，只是文字上有差异，因此，《仪礼》实际上无所谓今古文的问题。古文经多出的三十九篇，因不在当时通行的礼经之中，人们多不传习，后来渐渐失传了，人们称其为“逸礼”，其面貌今已不可知，甚至连篇名也很难考索。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的郑玄注，以及其它一些古书的注疏中，曾经提到《天子巡狩礼》、《朝贡礼》、《烝尝礼》、《王居明堂礼》、《古大明堂礼》等篇名，王应麟认为就是三十九篇“逸礼”之属。元儒吴澄又将这些文字分类汇辑，附在《仪礼》各篇之后。但也有学者认为，三十九篇“逸礼”传授不明，又无师说，可能是子虚乌有之物。清人邵懿辰认为，后人所引及吴氏所辑，内容与十七篇所记不相类，文字也不古朴，很可能是后人的伪作，而不是当时通行的礼。

关于《仪礼》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，学术界的看法一直有分歧。古文经学家认为出于周公，今文经学家认为出于孔子。古代的学者大都踵此二说。如崔灵恩、陆德明、贾公彦、郑樵、朱熹、胡培翬等均持周公手作说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说：“周公践天子之位，以治天下。六年，朝诸侯于明堂，制礼作乐。”他们认定，文中周公所制之“礼”，就是《仪礼》及《周官》等书，是周公损益三代之制而成；他们还认为，《仪礼》词意简严，仪节详备，非周公不能作。司马迁、班固等认为《仪礼》是孔子所作，说孔子慨叹周室衰微，礼崩乐坏，乃追迹三代之礼而作此书。邵懿辰则说：“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，……而孔子所为礼乐者，独取此十七篇

(《礼经通论》)。”此外，据《礼记·杂记》记载，恤由死后，鲁哀公曾派孺悲到孔子处学习士丧礼，皮锡瑞《三礼通论》、梁启超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据此认为，这是孔子作《仪礼》的明证，进而推定其余十六篇也是孔子所作。他们还认为，《仪礼》的文字风格与《论语》颇有相同者，内容也与孔子的礼学思想相一致，例如孔子很重视冠、昏、丧、祭、朝、聘、乡、射等八礼，而《仪礼》十七篇正是记述这八种礼仪的。因此，邵懿辰等断言，《仪礼》十七篇并非因秦火而残缺，而是孔子手定，用以教弟子的原典，因为，十七篇已足以总揽礼的大纲。但是，《杂记》所记是否真实，则很难断定。清人崔述就说：“今《士丧礼》未必即孔子之所书（《丰镐考信录》）。”先秦文献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左传》等，均未引及《仪礼》，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。日本学者武内义雄《曲礼考》认为，《荀子·大略》引《聘礼志》“币厚则伤德，财侈则殄礼”，与《礼记》“多货则伤于德，币美则没礼”之语相似，可能荀子时已有礼书，可以作为《仪礼》的蓝本。这也是推测之辞，因为《荀子》与《仪礼》的年代孰先孰后，不易立决。从周代金文以及《尚书》、《逸周书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毛诗》等文献看，周代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程式化的礼仪，贵族们经常举行各种典礼，如冠礼、觐礼、聘礼、飨礼、丧礼等，其仪节与《仪礼》所见有相同或相似之处，但似乎尚未完善到《仪礼》所记载的程度。孔子所传习的礼，是否就是《仪礼》，也缺乏硬证。近人沈文倬先生认为，《仪礼》一书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4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中，由孔门弟子及后学陆续撰作的。其中有关丧礼的四篇内容相贯通，著成年代当相近，约在鲁哀公末年至曾悼公初年，即周元王、定王之际。其说较为公允。

《仪礼》十七篇，除《士相见礼》、《大射礼》、《少牢馈食礼》、《有司彻》等四篇之外，其余各篇之末都有“记”。一般认为，记是孔门七十子之徒所作。《丧服》一篇体例较为特殊，经与记均分

章分节，其下又有“传”。传统的说法认为，“传”是孔子门人子夏所作。但是，也有人认为，此子夏为汉代人，与孔门的子夏同名，而非一人。纷纷之论，莫衷一是。

## 二、历代《仪礼》研究概况

据《史记》记载，西汉初最早传授《仪礼》的是高堂生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汉兴，然后诸儒得修其经艺，讲习大射，乡饮之礼。……诸学多言礼，而高堂生最本。礼固自孔子是，而其经不具。及至秦焚书，书散亡益多。于今独有《士礼》，高堂生能言之。”一般认为，高堂生把《仪礼》传给萧奋，萧奋传给孟卿，孟卿传给后苍，后苍传给大戴（戴德）、小戴（戴圣）、庆普。此即所谓《礼》的五传弟子。但是，《史记·儒林传》所记，在萧奋之前还有徐氏，萧奋之《礼》当得自徐氏。徐氏与高堂生之关系已不可考。《礼》为五经之一，最初的《礼》博士是谁，今已不可考。宣帝时，博士后苍以《诗》、《礼》名世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后苍以《礼》授“沛闻人通汉子方、梁戴德延君、戴圣次君、沛庆普孝公。……由是《礼》有大戴、小戴、庆普之学”。西汉政府设立的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“五经博士”，都是今文经学。《礼》也不例外，大、小戴及庆氏三家也都是今文经学，其中，大、小戴列于学官，庆氏不立于学官。

汉代经学的特点是，西汉为今文学独尊，解经重在微言大义；东汉则今文中杂有古文，因而往往详于章句训诂。但是，礼经似不在此例，因为礼经以名物制度为主，均是专门之学，古制茫昧，文字简奥，所以从一开始就注重于训解字义。

西汉时，今古文之争壁垒分明，不相为用。东汉以后，不少

今文学家逾越家法，杂取经讖，以应时需。

最早为《仪礼》全书作注的是郑玄，在此之前，只有少数人为《仪礼》某篇作过注，如马融作《丧服注》即其例。郑玄，字康成，北海高密（今山东高密西）人，东汉经学大师。经学界称郑众为先郑，故又称郑玄为后郑。郑玄曾入太学从第五元先学《京氏易》、《公羊春秋》等今文经。后又师从东郡张恭祖学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古文尚书》等古文经，最后师从扶风马融。游学十余年后，回归故里，聚徒讲学，弟子达数百千人。后因党锢之祸而被禁，遂潜心学术，遍注五经，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。郑注《仪礼》的特点是：一，抛开门户之见，兼采今古文，博综众家，择义优者从之。从今文者，则在注内列出古文，如《士昏礼》“主人拂几授校”。郑注：“古文校为枝。”从古文者，则在注内列出今文。如《士相见礼》“若父，则游目”，郑注：“今文父为甫。”若今古文之字义均合于文意，则互换见之。当时，学者苦于家法繁冗难从，郑玄沟通今古文，学者读之，可不再舍此逐彼，因而靡然从之。二，郑注文字精审，要而不繁，如《仪礼》的《少牢馈食礼》全文共2979字，注仅2787字；《有司彻》全文共4790字，注仅3456字。这是十分难得的。三，发明义例。四，去取谨慎。例如，《仪礼》的《丧服传》，郑玄确认有错简，但他决不轻易删改，而只是将自己的意见在注文中加以说明，以保存书的原貌。由于郑注的种种优长，使它很快取代了《仪礼》的其它注本，成为唯一的通行至今的注本，可见其影响之大。郑注的不足是，好事综合，以不同为同，多生谬解。此外，好引讖纬之说，多有迂怪之谈，至今为人诟病。后世学者对郑玄或褒或贬，褒之者称赞他“括囊大典，网罗众家，删裁繁诬，刊改漏失，自是学者略知所归”，是三礼的功臣；贬之者指责他泯灭两汉经学之家法，“望文穿凿，惟凭秘臆，以为两全，徒成两败”，是三礼的罪人。平心而论，郑玄之注，应该是功大于过。郑玄注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、

《礼记》，使三礼之成为显学，为学者所重。汉儒以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名家者很多，而以礼名家的，实际上只有郑玄一人。

晋初，“三礼”都立于学官，但王肃借助政治上的势力，与郑学争胜，如丧制，凡遇郑、王歧异者，可依王肃之说变除。泰始二年（266），又依王说置七庙。郊庙之礼，皆用王肃说，不用郑义，因而受到一些学者的抨击。晋元帝设《周易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官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传》等博士诸官，其后，又准荀崧之请，设置郑注《仪礼》等博士。

南北朝时期，由于政权的分立，学术也分化为“南学”和“北学”。南学重玄学，北学重经学；南学约简，北学深芜；学术风格有很大的不同，《三礼》本是实学，非可空言，故学分南北，皇、熊立说虽异，而都在郑注的范围之中。刘宋雷次宗以精于礼学而著名于世，学术声望堪与郑玄相比，时人以“雷郑”并称。齐朝礼学也比较发达，最著名的学者是王俭和刘瓛。王俭长于礼学，熟悉朝廷的各种礼仪，朝中每有关于礼仪的论辩，他都旁征博引，语折四座，为之定论。刘瓛则是私学中的大儒，著有多种有关礼义的文集，名冠当世，著名学者刘绘、范缜、司马筠等都是其弟子。

南朝是一个宗法色彩很浓的社会，当时的门阀士族，严辨宗法血统，十分重视宗法礼制的应用，统治者也很注重礼仪典制的修订，礼书遂成为主要的理论依据。《仪礼·丧服传》对丧服的等级、样式以及服丧者的身分等，都作了严格的规定，它标志着人们嫡庶亲疏和等级身分，几乎具有与法律等同的效应，因而尤受重视，雷次宗曾为皇太子等讲《丧服经》，晋宋南方诸儒，尤其热衷于《丧服传》的讨论，著述也很多，如王俭著有《古今丧服记》、《礼仪答问》等。晋袁准、陈铨各注《丧服经传》一卷，晋孔伦，宋裴松之、蔡超宗各撰《集注丧服经传》一卷或二卷。宋雷次宗撰《略注丧服经传》一卷，晋杜预撰《丧服要集》二卷，卫

璿撰《丧服仪》一卷，环济撰《丧服要略》一卷，蔡谟、贺循各撰《丧服谱》一卷，葛洪《丧服变除》一卷，孔衍《凶礼》一卷，贺循《丧服要记》十卷等。

梁朝的礼学在南朝中最盛。天监初，何佟之撰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五礼，共一千余卷。天监七年（508），梁武帝为皇子的丧服问题召群臣廷议。据《南史·儒林传》，当时的著名学者何佟之、司马筠、崔灵恩、孔奂、沈峻、皇侃、沈洙、戚衮、郑灼、张崖、陆羽、沈德威、贺德基等都系统研习过三礼，或者就是博通三礼的专家。沈不害曾总著《五礼仪》。《仪礼》研究成就最高的学者是鲍泉。

北朝经学直接承袭汉代经学，其特点是重训诂，重实用。通礼学的著名经师有刘献之、张吾贵、徐遵明、卢景裕等。据《北史》，魏末大儒徐遵明师承多门而独树一帜，兼通群经，邃精“三礼”，授徒讲学，是北方最大的经师。当时尤为崇尚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通“三礼”者，几乎都出其门下。徐遵明下传李铉，李铉又传刁柔、张买奴、刘昼、熊安生等，熊安生又传孙灵晖、郭仲坚、丁侍德等。徐氏后学都通《小戴礼》，兼通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者，十有二三。沈重为南梁儒者，为梁武帝五经博士，博通于礼。熊安生专以“三礼”讲授，颇为周武帝所重。

南北朝之时，诸儒倡为义疏之学，其功不可没。南如崔灵恩《三礼义宗》三十卷。戚衮受“三礼”于刘文绍，官至江州刺史，撰有《三礼义记》，逢乱亡失。北如刘献之《三礼大义》四卷，李铉《三礼义疏》，沈重《仪礼义》三十五卷以及《仪礼音》等。

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郑玄之后，王肃曾作《仪礼》注十七卷，但其书在唐初即已不传。

从汉魏六朝到唐，儒家的经典历经传抄，文字错误已经不少，对经义的说解，也是各奉其是，不归于—，而且章句繁杂，不便阅读，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，统一经学思想，唐太宗诏令国



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为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等五经作义疏，以资讲习，总名为《五经正义》，共一百八十卷，永徽四年，颁于天下。与此同时，贾公彦为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作疏解，杨士勋和徐彦则分别为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作疏解，此四书也列入官学。《五经正义》对六朝以来的义疏进行了归纳和总结，融合了南北经学家的种种长处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。自唐至宋，明经取士，都以此为定本。

贾公彦的《仪礼注疏》，是最早为《仪礼》全书作疏解的著作。不过，学术界对贾疏的评价并不太高，原因是，贾氏所能依据的材料太少，《丧服》一篇所引章疏，尚有袁准、孔伦等十余家，其余各篇所引，只有南齐的黄庆、隋的李孟哲两家而已，详略十分悬殊，而黄、李二家之注疏漏之多，连贾氏自己都不满意。这与贾氏取材宏富的《周礼疏》相比，尤显单薄。

唐以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三礼》、《三传》合为“九经”，考课取士。按经文字数的多少，将“九经”分为三等：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为大经，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公羊》为中经，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穀梁》为小经。由于《礼记》的字数比《左传》少，所以，攻大经者竞相读《礼记》；中经与小经之中，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四经或文字艰深，或经义晦涩，难收速效，故鲜有攻读者，这是“三礼”之学中衰的重要原因。

宋神宗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，宣布废罢诗赋及明经诸科。《仪礼》在废罢之列，古代科举分房阅卷，自此之后，再无《仪礼》之房，诵习《仪礼》的学者寥若晨星，《仪礼》之学受到冷落。但宋代在《仪礼》校勘和研究方面，仍有不少值得称道的著作，如张淳的《仪礼识误》，李如圭的《仪礼集释》、《仪礼释官》和《仪礼纲目》，魏了翁的《仪礼要义》，朱熹的《仪礼经传通解》，聂崇义的《新定三礼图》和杨复的《仪礼图》等，下面略作介绍。